

为奋斗的人们留下新的印记

□梁鸿鹰

人类天生有追逐梦想的冲动,在这个路途上,人们付出辛劳、流淌汗水,但未必能够有所得,能够实现梦想。曾在一个场合听到有人说,打工的人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但看着自己参与建设的拔地而起的高楼,他们发现今天却离梦想越来越远。果真是这样的吗?有这样的情况,但更多的情况是不尽然,安徽作家许辉、苗秀侠合著的长篇小说《农民工》,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形象的答案。

进城务工者或者说农民工,早已成为一支数量庞大、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业已成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密切相关的群体,关于他们的文学书写,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已经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增长点,无论是打工者多少年来不停的自我书写,还是大批作家的倾情关注,都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新鲜元素,这些元素之所以值得充分关注,就是因为一方面连接着一个蔚为广大的一个群体的命运、生活与希望,一方面考验着书写者的良知、责任与担当。

到底对这些时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们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如何反映,对他们的生存、精神处境,文学应该如何表达,永远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好在我们的不少作家思考、探索、实验,甚至在用与农民工同样辛勤的劳作,陆续地交出自己的答卷,而在这些答卷中,由安徽

作家许辉、苗秀侠合著的长篇小说《农民工》,无疑是其中出色的一份。作品单刀直入,农民工这个群体为主角,以他们遇到的问题为素材,通过发生在农业大省安徽阜阳一个普通农民工张如意故事,同时也通过名叫杨稳当、王四清等其他农民工的遭际的展示,反映了一群淮河流域的农民,带着满脚的泥土、辛劳的倦容,毅然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与家乡,远赴他乡,来到向往已久的城市,试图进行改变命运、证明自我的历程,这种认识价值,是一般的写作所提供不了的,值得认真关注。

其实,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中国农民工走过的道路,有着相当的普遍性,从进城打工求得生存与温饱,到自我逐渐成熟,进而求得在城市里找到立足之地,走向自立,除发展自己,最终也能够创业有成,这恐怕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人群,走过的一条共同道路。不管是书中描写的张如意、刘丽芳,还是王四清、杨稳当,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在走出淮北平原穷困乡村的时候,他们确是想通过乡土迁徙来改变命运。奋斗故事永远具有吸引人的力量,透过这里面的曲折、付出,有着我们民族信仰的价值,有着人们千百年愿意托付的自豪,而更为可贵的是,小说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农民工积极向上整体精神面貌,通过小说让人们看到当代新农村的发展和进步,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许不少创作者有本事写出在转型的社会生活中的不如意、不

平等、不爽快,但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我想,断然写不出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写不出社会的本质,更无力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

《农民工》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其描写当中有一种朴实而自如的劲头,看得出,作家深入过那些劳作着的人们生活,知道在他们生活经历中,其实充满了灰尘、汗臭,但也不乏让人惊喜的波折,因此,我们在读书过程中,读到了这些小人物的诗意、读到了他们给我们出其不意的撞击,比方,书中有个叫康成的小人物,他与打工妹刘丽芳谈情说爱,有一次在他居然在冷饮店里说:“爱是个小我的东西”,这就很有意思,刻画他那种浮游在社会上高不成低不就的复杂心态。比如小说写到,过年了,城里人都回家团聚,打工仔张如意与王大亮走不了,他们喝着小酒,走到屋外时发现:“天空亮着七彩的礼花,不知哪家人在放烟花,鞭炮噼里啪啦响做一团,世界变得如此繁闹美好。”还有一些段落,是试图深入人物心理律动进行更为细腻真实的描写。作者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把新时期农民工兄弟的敢想敢干、艰苦创业的品质和力量凸显出来,同时也把他们人生的不幸和对命运的抗争不加保留地加以书写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也带来了新的人生。“对故乡厚土的挥之不去的苦恋与对幸福未来的难以遏制的欲求”,是农民工的共同经历,他们既连接着乡村、也连接着城市,他们的根本心理特征是由我们国家现在城市与农村二元化的结构所决定的。小说后来描写了“凤还巢”回到家乡投资的故事,小说通过农民工外出创业、而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提出了一向为人忽略的农民工的“资本”问题,算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新话题,相信会引起有实际借鉴意义的更多讨论。

历史和命运在此交汇

□老 坞

“农民工”,一个跨越两个阶级,又联结城乡广袤国土的概念。一个被广泛关注,又绵延了几十年的话语对象。一个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已不可或缺,又主体性丧失,依然与我们疏离着的“身边人”。文学描写农民工,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通常赋予怜悯、同情的感情,表现其底层、弱势的命运,可它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概念的模糊性,是由于它疆域的伸缩,内涵的不确定性。“农民工”这一充满中国特色的经济力量进入了时代潮流,已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人们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引进、重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快速增长,却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讲到生产力现在习惯定位就是科技,但生产力的基础部分却是人),正是农民工,奠定了中国当前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农民工,还是一个正在生长、未定型的人群、概念,正因为如此,许辉、苗秀侠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完整地描写这一人群,抒写他们的成长和命运,才显得更加不同凡响。

中国的产业工人来源于农民,这点毋庸置疑。这与西方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手工业者,分化后,循序前进有很大不同。譬如艾芜上世纪50年代末的小说《百炼成钢》中塑造的新型工人形象秦德贵,便是出身于农村和有农村背景的产业工人。只是当前汹涌的打工大潮中,现在的农民工,与当年的工人,与招贴画上我们熟悉的工农兵的形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许辉、苗秀侠小说中的张如意并不处处“如意”,农民工至少在一开始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身份,他们还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对于农民工而言,多重身份可能便是没有身份,而丧失身份往往也就是丧失了权利——它与当今社会另一类能以多重身份谋取利益的人,可能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最为有趣的现象。农民工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求温饱、求发展,身份暖昧使他们处在文化的夹缝中,他们是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又怎样谱写自己的人生篇章,并最终汇入到历史潮流之中?《农民工》呈现的便是这样的历程,表现张如意和他的身边人、家乡人如王四清、杨稳当、刘丽芳、刘晓梅等人生故事。它再现历史,又抒写命运,而“再现”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范畴。

从不确定性出发的写作,带来差异及丰富的变数和不同命运的发展。“过程性”是这部小说显著的特征。它全部采用短章节的结构,口语化的标题,贴近人物与表面不加修饰的叙事方法,去除隔阂,由此反而使我们更能清晰地听到这一人群心灵的脉动。我们命运的根源在我看来有三:一是历史,它不属于个人却要影响每一个人;二是文化背景,传统表现到不同领域,而命运出发点则要依托不同的传统;第三才是个性,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小说中张如意的每一步踏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他勤劳、能干,特别能“忍耐”;又正直、仗义,渡过了种种难关,始终坚守道德的底线;当然在人生追求中,他也不乏斗争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和刘丽芳一样,都是“不认命的人”。但我还是不禁要提出问题:是否最终都要成为企业家、老板才算成功,才算“如意”?

许辉、苗秀侠的写作是探索性、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它是传统的人物“命运”写作。成功者与失败者,幸运者与不幸者都应“运”而生,在“农民工”这一庞大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农民工》重演一段历史,也成就一段历史。中国的现代化似乎要重返过去的逻辑,正应了那句俗话:为了更好地跃进,需要后退后一步。我相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有原型的写作也符合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增加了文学的说服力。《农民工》朴素的、本色的叙事风格,也优于那些夸张、嘲讽与变形的叙事,因后者虽能带来新一层理性的认识,却会阻断感情,丧失一部分生活本身的力量。历来重大题材创作往往都不甚让人满意,如写“文革”、知青、战争等,在中短篇小说中还是有许多好作品的,长篇则难。先不讲原因,《农民工》这样接近于纪实风格的小说还是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的生活。这是《农民工》揭示的深刻主题。小说中的人物是平凡的,他们始终有着对改变自身命运、创造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热烈向往,尽管有先天不足,有失败、无奈甚至茫然,还要经常面对无法抗拒的劳累和不正当的待遇,但他们却顽强地相信未来,固执地恪守着做人底线,为拼搏而快乐,为尊严而生活。小说透过对主人公张如意多元矛盾性格的刻画及其传奇又真实的人生经历的描写,有力地张扬了以张如意为代表的当代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生活理想、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实,始终坚持诚实守信,坚定人生方向。张如意、刘丽芳、王四清、杨稳当、刘晓梅他们是我们经济社会中的微小细胞,是城市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务工个体。但正是他们推动了城市建设,方便了城市生活,也成就了我們小康社会的建设。作者以扎实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功力,通过表现小人物的奋斗和理想,揭示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更美好,人性的光芒,特别是通过张如意带领工友“凤还巢”回家乡投资一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农民工成长的自信,以及这些不寻常的社会财富创造者的文化自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本领的农民工,回到农村重新创业、让理想、信念、才干在故乡土地上开花结果,这种故事结局固然美好,但这仅仅是作者为我们设计的一种可能。他们的社会要像张如意他们创造更好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既可以成为现代农民,也可以成为现代产业工人、职业经理人……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再为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医疗卫生、劳资纠纷等烦恼,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完全放开手脚地追求梦想、创造价值,赢得尊重。这是《农民工》启发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理性面对和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从「受难者」到「大写的人」

□吴义勤

农民工的志向、追求和精神姿态。他们走向城市,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的挑战,但仍然有着传统农民的精神品格,如吃苦耐劳、憨厚淳朴等等。他们在新城市环境中,面对物质的诱惑,以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真正诠释了农民工的意义。他们不是盲目的物质追逐者,他们忍辱负重,有着更为长远、宏大的理想,有着积极向上的姿态和敢于接受挑战的勇气。《农民工》对这种农民工精神的赞颂,也区别于以往农民工的受难者形象,他们不再卑微,而是有尊严、有理想的站立着的“大写”的人。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写,关注和拷问社会现实,反思了现代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化中农村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危机这一宏大的命题。作者有建构中国乡土史诗野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野心。小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写到当下,具有宏大的时空结构,通过农民工们在爱情、事业等历程中的苦难、选择、追求、变化折射时代的巨大变迁。小说既写到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物质欲望的膨胀,以及被财富所扭曲的人心,被金钱所裹挟的无尽的欲望,也写到了在物质冲击下,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为理想而奋斗和拼搏的品格。可以说,《农民工》既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完成了对当下乡土中国和社会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通过张如意等人物表现了遭到重大冲击的乡土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小说以诗性的方式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史和中国农民的精神史、成长史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在表达沉重主题时,依然以积极的人文情怀和向上的姿态透露出温暖和希望。

总之,《农民工》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工的描写,摆脱了种种文学史规范和传统的制约,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述没有刻意的渲染苦难、暴露黑暗,而是以更加鲜明的人文情怀赋予农民工以高贵的姿态。农民工不再是受压迫的纯粹“讨生活”的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无疑预示着乡土中国的希望。从叙事姿态上看,小说以乡村作为叙事的中心,乡土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得到确认,这与以往他们的眼光观照乡村的启蒙视角和意识形态视野不同,作家的笔墨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而是充满着对乡土中国情感的关切以及自身的痛苦和喜悦,某种意义上,《农民工》堪称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书写“土改”、“合作化”等“新的时代”和“农民新人形象”之后,“农民”文学形象塑造的又一次革命。

对当代农民工精神的深情礼赞

□徐忠志

“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大问题,文学界对此始终抱有深沉的情感和长期的理性关注。“农民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支脉,也一直被作家所牵挂。据统计,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4亿人,而且我国农村仍然还有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农民特别是新成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将会持续下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且是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是他们的廉价劳动给“中国制造”以持久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个角度讲,关注、书写农民工既是关注社会现实,更是关注中国未来。作家许辉、苗秀侠的长篇小说《农民工》就是表现这一题材的厚实之作。

小说以中国农民工输出大市安徽阜阳的农民工为表现主体,讲述了一群淮河流域的青年农民,从进城务工求生存、求温饱,到求自立、求发展、最终创业有成的奋斗故事,客观呈现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描写了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精神成长,塑造了张如意、刘丽芳、王四清等有血有肉的农民工形象。作者能够以充沛的情感、礼敬的态度、温暖的笔调、深邃的思考、沉稳的架构,出色地完成小说文本的创造,具有典型意义的阜阳农民工生活写得栩栩如生,对当代农民工精神进行了诠释和礼赞。小说对农民工城市寻梦的描摹,对务工生活细节的刻画,对农民工艰难打拼经历的书写,特别是对张如意们精神世界的窥探,显示了作者对农民工生



新时期以来,大量农民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到城市寻路谋发展,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这样一个被统称为“农民工”的以数亿人口计数的巨大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的打拼,他们与故土和故土上的亲人们的牵连,其间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故事,他们的命运遭际会以怎样的方式展开,令人悬想不已。不会有人怀疑,这个题材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蕴藏了文学书写的巨大空间和丰富的可能性。

许辉、苗秀侠的长篇小说《农民工》,就是这一题材领域的一个重要收获。在小说中,张如意、刘丽芳、杨稳当、王四清等多位青年农民,远离贫穷的家乡皖西北阜阳农村,到千里之外的城市寻梦。全新的生存环境,卑微的社会身份,使他们改变命运的期盼变得十分艰难,到处受骗上当地,遭人歧视,被人欺负。但他们凭借不懈努力适应了城市生活,也让城市接纳了自己,不但解决了温饱,进而来自立求发展,一步步地开辟了新的天地。小说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中,展现了他们的打拼经历,描绘了他们的情感世界。这些内在和外在的经验都具有一种鲜明的典型性和标本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为农民工这一巨大群体精心书写的一部命运长卷。

在这些个体人生起伏坎坷的命运遭际背后,折射出了一个宏大的时代主题,那就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农民工》是一部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困厄有着深刻洞察力的作品。农民工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但却无法在新的地方获得灵魂的妥帖安放。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但却不属于城市。那种隔膜、疏离和尴尬,是无处不在的。这些让他们始终自认为是异乡人,难以排遣内心中的漂泊之感。相比物质生活方面的艰难窘迫,他们内心世界的苦楚和落寞更为强烈和深沉。这部作品的一个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形象地揭示出即使是像张如意这样的成功者,有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在宁波买了房子,娶妻生子,把母亲也从乡下接来同住,但内心仍然难以融入城市。他的处事方式打上了鲜明的农业文明的烙印,婚丧嫁娶、开业剪彩等,一应按照乡村的方式。小说描写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传统的深厚与其亲和人性的美好的一面,也揭示了这种传统在现在生活方式的大潮面前所遭遇的挑战和冲击,以及在这种传统哺育下成长的人们的迷惘和无奈。在此意义上不妨说,从这部长篇小说中也可以获得诸如社会学等学科的观察视角和认知价值,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它同时也具备了某种文献的意味。

当然,这一切首先都是筑基于作品的出色的文学呈现之上。这是一部朴素的、接地气的作品,真实感是其最为厚重的底色。作者并无意人为地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但主人公们的尴尬处境,他们所生存的这个令人眼花缭乱变革时代,这些因素的充分交集,本身就已经很自然地构成了丰富的戏剧性,人物命运、故事进展跌宕起伏,足以让人沉浸不已。读这部作品,一幅色调复杂、五味杂陈的生活图景在眼前缓缓展开。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发展中的社会的奔涌活力,感受到主人们身上闪烁出的美好的人性之光,并由衷地相信这种真善美的人性正是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证,同时也看到种种的不如意、缺憾甚至丑恶。小说最后部分对乡村现状的描写尤其令人触目惊心:乡村普遍空巢化,土地大量撂荒,夫妻一方长年在外打工引发婚姻危机和道德失范,孤苦无助的老人,缺少关爱的留守儿童,等等。这一切在小说中都有着生动的表现。尽管作者用一种冷静克制的笔触描绘这一切,但字里行间依然流淌着悲悯之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关注国运民瘼的忧患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有力的继承与发扬。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作者对于这一文体的审美品格、内在艺术特征的自觉和遵循。其中人物塑造的生动传神尤其重要。这方面,《农民工》有着不俗的表现,塑造了几位能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人物。张如意的成功,就在于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不断自我培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禀赋能力。他吃苦耐劳、勤奋认真。他重义气,远赴东北救援身陷困境中的乡亲,呵护关心受工伤残疾的铁族,为其找对象成家盖房子。他讲诚信重然诺,克服困难归还借款,并因此获得了开发商的信任,得到了项目,收获了第一桶金,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刘丽芳自尊自爱、对感情认真而执著,以女性的聪颖、善解人意和韧性,拓展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绰号“花被子”的杨稳当,处事机灵,头脑活泛,但他本性中的质朴,却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丧失殆尽,他的虚荣心、贪图占便宜走捷径的念头,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在对不同人物的描绘和臧否中,这部作品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土地是道德的守护神。

生动而细腻的细节描绘,也是该书作品颇为值得称道之处。作者对所描写的生活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很多地方不曾亲历和细加观察是写不出来的。像小说开头张如意一行在黎明时分离家出发,顺着麦陇行走,经霜后的麦棵变得像麦茬一样扎脚痒;像对抗洪培墙中数百位阜阳民工所戴的草帽的形状和色彩的描写,都十分富于质感。特别是对铁孩成婚的那一章节,对乡间民俗的细腻描绘,生动传神,诗意流淌。这些细密之处,带来的一种原初的、民间的生活气息,给阅读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有力地提升了作品的美学质地。

对一个群体命运的书写

□彭程